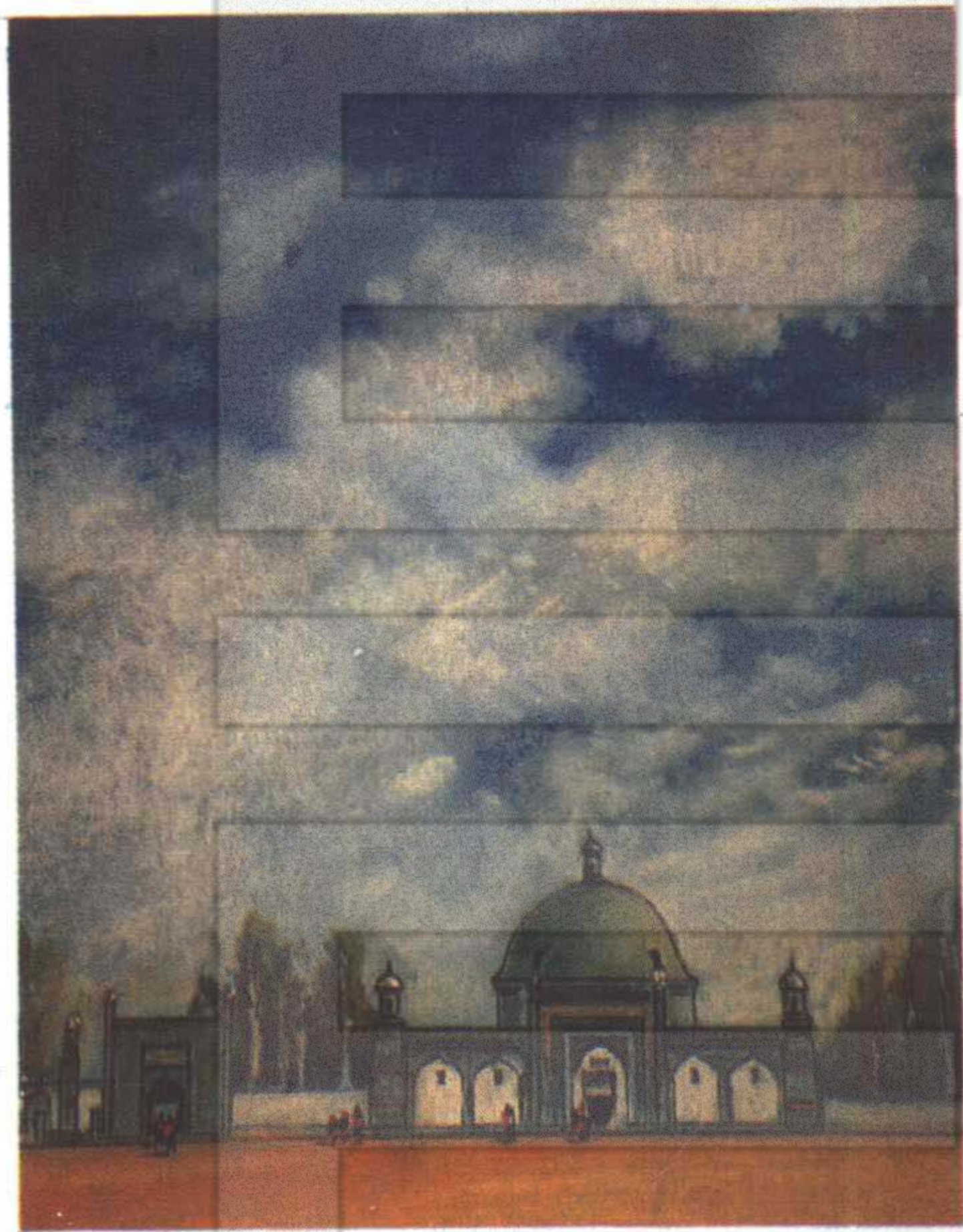


重返 喀什噶尔

【瑞典】贡纳尔·雅林 著



雅林文集

重返喀什噶尔

[瑞典]贡纳尔·雅林著
崔延虎 郭颖杰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春华

封面设计:汪又红

雅林文集

重返喀什噶尔

[瑞典]贡纳尔·雅林著

崔延虎 郭颖杰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 830001)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78千字

1994年10月第一版 199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1000

ISBN 7-228-03047-8/K·339

定价:18.00元

杨 镰 主编

瑞典东方学译丛

本书由瑞典协会资助出版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the Swedish Institute

贡纳尔·雅林及其东方学研究

(代前言)

杨 镰

前不久,我见到了瑞典著名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多弼教授。我们谈起瑞典已故的汉学家高本汉。这时我才听到一则有关高本汉的轶事:高本汉晚年见到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李约瑟问:“你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哪一年?”高本汉回答:“1928年。”“为什么近几十年都没回到中国去看看?”高本汉沉默了片刻,仿佛自语般地说:“我更喜欢古典的中国。”

罗多弼教授又告诉我,据说在1978年,中国政府曾正式邀请高本汉访华,遗憾的是,邀请信发出时,高本汉已经去世几个月了。

听到这儿,我立即想到另一个同样著名的瑞典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雅林第一次去中国是1929年,那正是高本汉最后一次访华刚结束;而1978年,正在拨乱反正、极力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的中国,曾邀请了两位瑞典学者访华,高本汉的请柬已经无法送达,但另外一位则欣然接受了邀请,于近半个世纪之后,又回到魂牵梦绕的中国,他,就是雅林先生!

贡纳尔·阿尔弗雷德·雅林于1907年出生于瑞典南方的斯堪尼亚省,他的出生地是离海不远的小村镇威肯。他的父亲是农

民, 家里有 8 个儿子, 雅林是长子。

他的中学、大学都是在瑞典南方的大学城——隆德度过的。1928 年, 他毕业于隆德大学, 并获得了日耳曼语及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的学士学位。他立即又开始攻读突厥语, 并在瑞典第一代突厥语学者古斯塔夫·拉奎特指导下, 以半工半读的方式, 为父亲的支持与理解所鼓舞, 终于念完了研究生课程, 于 1933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学习突厥语时, 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被一些人看来相当艰难又前途渺茫的专业, 并被同学们称为“突厥人”。他的老师拉奎特是个在中国新疆工作过多年的传教士、医生, 受老师影响, 他选取了《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这个前人极少涉足的论文题目。

为了准备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他于 1928 年春夏间专门到德国柏林参加了“东方学讲习班”, 受教于著名东方学家班格教授。讲习班的同学, 比如葛玛丽女士及门格斯等, 后来都成了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家, 在学术界活跃了半个世纪之久。为了准备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 他于 1929~1930 年, 专门不远万里, 穿过广袤的俄领中亚, 随马帮翻越了帕米尔高原, 来到新疆南部的首府喀什噶尔。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他尽量撙节经费, 深入到民间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角落, 出色地完成了修学考察。他还准备前往和阗, 去调查那儿的维吾尔语方言, 但是一场几乎致命的伤寒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直到 1992 年我到他在威肯的别墅去拜访他时, 谈起往事, 他仍为未能亲自收集到和阗方言而深感遗憾。

研究生毕业后, 雅林留在隆德大学, 担任突厥诸语言的助教。他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 到苏联、印度、阿富汗、中东、土耳其等地, 作广泛的调查研究。

1939 年的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雅林的生活道路。他在瑞典北部服兵役时,曾结识了一位军官。那年这位军官派人到隆德大学找到他,要他临时担任一个只会讲土耳其语的难民的翻译。正是由于这一契机,使瑞典外交部对雅林的语言才能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 年,雅林离开教育界,转入外交界,被派往瑞典驻安卡拉的公使馆。此后,他成为瑞典外交界的新星:

1941~1945 年,担任驻德黑兰和巴格达的瑞典外交官。

1946 年,他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建立起第一个瑞典大使馆。

1948 年,他出任瑞典驻印度的公使,后来又成为驻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的公使。

1951~1956 年,调回国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长。以后,他又担任了瑞典驻联合国大使,并于 1957~1958 年间,出任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时,又被任命为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争端的调解人。

1958~1964 年,担任瑞典驻美国大使。

1964~1973 年,他出任瑞典驻苏联大使,并自 1965 年起,还兼任瑞典驻蒙古大使。

1967 年 10 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中东地区特别代表,承担起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斡旋的重任。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工作。1971 年,他被提名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在投票时,以 3 票之差,败给奥地利外交家瓦尔德海姆。

自 1973 年起,他从职业外交官的岗位上退休。

从 1933 年出版博士论文《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至今已达一个花甲。不论是在大学还是在繁剧的外交界,他一直在发表有关东方学的论著,并始终不懈地收集、刊布、研究有关维吾尔语

言、历史与文化的资料。自从退休后,他又开始整理导师拉奎特遗留下来的文稿。当然,他也写有不少有关外交政策、文化事务方面的文章。

作为一个成功的外交家、享有盛誉的执著的学者,雅林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到1976年时,主要的就有:

获乌普萨拉大学(1959)、奥格斯塔纳学院(1960)、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1963)等院校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获纽约名人奖(1971);

获斯德哥尔摩卡尔·斯诺斯基奖(1973);

获伦敦珀西·塞克斯爵士纪念奖(1974);

由于对查尔斯十二世时代的瑞典——土耳其关系的研究成果,被接纳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科学院的成员(1968)。

他还是瑞典皇家文学协会会员(1965)、皇家自然地理学会会员(1972)、军事科学院成员(1970)。他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聘为名誉会员。

1994年4月,瑞典国王亲自授予他“人类学和地理学协会金奖”。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正是斯文·赫定。

二

雅林是以一个东方学家的身份进入外交界的,自外交官岗位上退下来,他仍然保持着东方学家这一身份。他不但是瑞典最有影响的外交官之一,也是瑞典最知名的东方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治学态度,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尊重。

1992年10月,中国瑞典联合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会议在乌鲁木齐正式开幕。这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得到过

雅林先生的关注,开幕式一完,我与瑞典朋友及美国的包森教授用长途电话同雅林作了交谈,他对会议表示了由衷地祝愿。会后,我们赴南疆作学术考察。在沿和田河前行的艰难行程中,正值雅林的生日。抵达和田市,瑞典朋友又与我用电话向雅林表达了对他生日的问候,并简述了观感与行程。瑞典学者罗森教授告诉我:雅林是瑞典东方学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也是他那一代人(如葛玛丽等)当中,唯一一位至今仍在从事东方学学术研究,对东方学的发展有难以估量的影响的人物。他对中国、对新疆、对维吾尔族的历史与文化,始终抱着无法释怀的挚爱之情。当然,他也是中瑞这两个远隔万里的国家间理解与关切的桥梁。

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雅林的论著并不以数量取胜。在他的东方学著述当中,较有影响的有:

《维吾尔语语音学研究》(1933年,隆德);

《阿富汗斯坦的维吾尔人部落的分布及初步分类研究》(1939年);

《维吾尔语——英语方言辞典》(1964年,隆德);

《古斯塔夫·拉奎特与“卡西姆阿洪致卡米尔·阿凡提的信件”研究》(1975年,隆德);

《新疆南部瑞典传教士报告中的民族学资料》(1979年,隆德);

《重返喀什噶尔》(1979年,斯德哥尔摩;1986年,美国杜克大学);

《喀什噶尔文学文献》(1980年,隆德);

《关于维吾尔语“穆纳扎拉文学”的札记》(1981年,隆德);

《关于新疆丝绸之路上近年考古新发现的看法》(1983年);

《喀什噶尔手稿》(1987年,隆德);

《无贼城等维吾尔传说研究》(1989年,隆德);

《喀什噶尔的印刷品——瑞典传教团在新疆的印刷所:历史与印刷物概述》(1991年,斯德哥尔摩);

《中亚地区的文化碰撞——新疆穆斯林笔下的汉族戏剧》(1991年,隆德);

《瑞典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中国新疆的材料》(1991年,刊于《中亚学刊》总第35卷)。

从上述并不完备的目录,就可以看出雅林学术生涯的两大特点:一,东方学研究贯穿始终。其《维吾尔语——英语方言辞典》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首创之作,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其书编成出版时,雅林正在瑞典驻美国大使这一重要的外交职务上,而上述著作中的绝大部分,撰写出版于其退休之后。换句话说,不论是身为高级外交官还是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涯,他始终以东方学家自视,对中国新疆的热爱与关切从未减退,反而老年愈为浓烈。二,新疆,尤其是南疆的首府喀什噶尔一直是他研究的中心。初到喀什时,他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此后,他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获得了难以计数的荣誉与奖励,但终身从未冲淡喀什噶尔留下的强烈、深情的印象。1992年我去看望雅林先生时,他对我说:一想到喀什噶尔,他仿佛又年轻了,回到了20岁出头的美好年华!这时,我为这位已85岁高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感动,我觉得他是那么真诚、平易近人,那种“西域情结”在我身上,在我许多朋友的身上,都确确实实存在着。它并不因地位、地域、年龄、民族等许多不同而因人而异!

作为拉奎特的学生、第二代东方学家的代表人物,雅林从外交官职位上退休已20多年,但他仍在威肯宁静的别墅中从事研究、写作,他无意、也不可能再从东方学家这个位置上“退休”。每

一个关心新疆、研究新疆的人，都应该以有这样一个前辈学者而自豪！

三

1989年的秋天，我随几个瑞典朋友来到喀什噶尔。在巴扎上，一位老人主动攀谈，问：“你们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

“我们是瑞典人，”精通中文的秦碧达女士说。见老人听不明白，她又补充道：“瑞典，Sweden！”

“啊，Sweden，知道，知道！”老人活跃起来。“四五十年前，喀什有许多瑞典人，他们还给我看过病。”在夕阳返照下，老人眯缝起双眼，回忆着，“瑞典，……那是个遥远的国家，要骑骆驼，乘火车走几个月……”

喀什外办接待我们的一位维吾尔族干部热情地说：“1978年我接待过瑞典的雅林，你们认识他吗？他身体好吗？”

雅林！当然，我的几位瑞典友人都认识他，来中国前还专门去看过他。而我，只是上中学时从报纸上得知作为中东特使的外交家雅林，后来应秦碧达之托，曾为他找过一些维吾尔文书籍。

一年后，我才见到了雅林先生。

我们在瑞典南部海边拜访了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驱车向北，沿海岸到达一个小城镇。瑞典朋友说：在这儿有个很好的旧书店，该去看看。果然，我买到了两种斯文·赫定的书，瑞典友人斯蒂格拿了一本精装书，说：“杨，我送给你一本书，这就是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

一个小时之后，我拿着《重返喀什噶尔》来到雅林在威肯的别墅。这个昔日的渔村已发展成消除了“三大差别”的美丽宁静

的城镇。两个多小时的无拘无束的交谈中,我们只谈了新疆、喀什噶尔。一谈到巴扎、艾提尕、俄国领事馆……,雅林就像年轻了许多。

我说:前不久我刚去瑞典档案馆看了新疆传教士档案,内容十分丰富。您对本世纪初的瑞典驻喀什传教团的历史也作过很多研究。

雅林说,是啊,我的老师就是那批传教士中的一员。1929年我是随传教士一起抵达喀什的,我得了伤寒,又是传教士救了我的命。这些内容,它(他拍了拍《重返喀什噶尔》)里面都写了。

从威肯回斯德哥尔摩的路上,秦碧达女士给我译述了《重返喀什噶尔》的主要内容。以后,我又得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我相信,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对于中国同行与国际东方学家学术思想的“接轨”,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简言之,《重返喀什噶尔》记录了雅林两次来新疆——1929~1930年、1978年——的观感。这两个相隔近半世纪的年代,对于东方学、对于中国都有其特殊的意义。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现代维吾尔语的成熟期,那时的语音学、方言学都相当典型,雅林在当时所作的调查、研究,对此后的维吾尔语研究至为关键。1978年的秋天正是打倒“四人帮”两周年,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正站在“改革”、“开放”的起跑线上,等待此后不久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响号令枪。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已经寿终正寝;一个改革开放、面对世界潮流的中国即将震惊世界。而《重返喀什噶尔》则以一个东方学家的眼光,对这历史性的变革作了准确、客观、入木三分的描写。

全书是以经历了半个世纪再回到中国来展开其笔墨的,雅林在开卷即指明:

写这本重游故地的书并没有什么秘不可宣的目的，……我既不曾特意寻访任何含有争议的主题，更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下面记载的，一方面是我对旧新疆的回忆，另一方面是我对中国那一部分尚未对一般外国旅游者开放的现代新疆的观感。

读了《重返喀什噶尔》，人们对雅林准确把握住时代脉搏的特点，印象颇深。雅林笔下的1978年的北京、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与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完全一致。那时，图书市场基本上仍是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政治读物，文艺创作尚远未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中缓过劲儿来，人们还习惯于把一切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真正的民族文化遗产还无处寻觅。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设性意见：要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抢救民间文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要把文化遗产中的菁华作为旧东西予以扬弃……。

而书中对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喀什噶尔和新疆，则满怀真切的思念之情。在他的笔下，半个世纪就仿佛只隔了一瞬间，喀什的色彩、喀什的气息、喀什的神秘诱人、喀什的古朴质直……，就像抒情诗，就像民间歌谣，直接从书本流向每一个读者的心间。

当雅林即将结束故地重游时，他以略带伤感的笔触写道：

我们行驶过的道路穿过几个维吾尔人的村子，村子里都是低矮的土房子，这是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房屋。我真愿意再次获得青春，以便能够在这种环境中住上几个月，这肯定会对研究维吾尔历史大有裨益，也会帮助我了解中国少数

民族的生活。

这里表达的,不只是一个东方学家对中国的情感,一个退休老人对青春岁月的眷恋,其间深含着对维吾尔族历史命运的关注,对中国各族人民必有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对中国的挚爱之情,贯穿《重返喀什噶尔》的始终。他对历史上破坏、拿走新疆文物表达了一个真正学者的义愤;在自己被好奇群众围观时,他联想起这样一件往事:30年代后期,在隆德街头他碰到一个观光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也受到了瑞典青年的围观辱骂,把他叫作“脏膝盖”,他忍无可忍,怒斥了围观者。在这些描写中,推己及人的胸怀把历史长河中的杂音化解得一干二净。

《重返喀什噶尔》之所以远胜于一般的观光游记,还在于作者对新疆土地与人民的深刻了解。正因为如此,书中的许多细节、插曲都有特殊意义。

比如李吟屏先生所著《佛国于阗》中提到一种维吾尔古籍——《塔吉起拉》。该书为斯坦因等人辗转引称,但它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却不甚了了。然而《重返喀什噶尔》中却指明,“塔吉起拉”只是传记之意,是个被支解了的书名,它的真正名称是《萨图克·布格拉汗传》。在1930年时,雅林本人从其朋友、书商肉孜·阿洪处买过一部抄本。

可以说,要认识本世纪前30年的喀什与维吾尔社会生活,就不能不读《重返喀什噶尔》,这类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我相信,凡认真读过本书的人,都会有同感。

从总的描写方式来看,《重返喀什噶尔》是一部诗意盎然的回忆录。书中不但有难以复制的独家见闻,有超越世纪的视角,

还有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其中把华灯初放的长安街比做一个机场的巨大的极其宽阔而没有尽头的跑道,就是韵味深长的一例。那时他刚来到久已向往的中国首都,而他的心早已飞到新疆、喀什,不仅如此,那时的中国,正是一个即将起飞的古老国度。这个比喻可谓写尽了作者的心境与感受。

仅就个人的角度而言,雅林描写他从身染伤寒的绝境中摆脱死神的片断,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描写之一。他写到一只喀什噶尔的黑乌鸦总在上午8点整来与他作伴,当他身体复员后,那乌鸦却再也不来。这个细节写出一个离家万里、负笈求学的欧洲青年的乡愁,也写出从重病到康复的放松感。

全书的总体结构,是建立在二三十年代与1978年的对比之上的,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角度。当然,如果说还有些遗憾的话,那么就是在今天——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高龄的雅林先生不可能再次重返喀什,并把1929—1978—1994这三个阶段作更全面的比较了。

关于雅林的东方学论文,由于篇幅关系,不能作全面的介绍与评述,但它们的特点是一致公认的,即每一篇都力图开拓一个新的研究园地。这里仅举《喀什噶尔的印刷品——瑞典传教团在新疆的印刷所:历史与印刷物概述》为例,略作分析。

此文是瑞典传教团设于喀什噶尔的印刷所的印刷品目录的“前言”,而这个印刷所几乎不为人们所知。然而,它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在长达30年时间里,它是南疆唯一的印刷所,是习惯于手抄文稿的喀什噶尔最先出现的印刷所,是今天新疆出版史上不能忽略的一页。在30年代南疆战乱中,它被迫印刷过许多政治性宣传品,这些宣传品内容正确与否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然而宣传品本身却为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再比如,《新疆钱币》收入有几种 30 年代南疆印制的纸币,还有伪政权的货币,甚至有独一无二的用布印的钱币,这些都成为收藏家的珍品,为 2 星甚至 3 星级的罕见之物。它们何时何地、由谁印制的,史无明文,什么书都付诸阙如。但据雅林此文与目录,可知它们都是由当政者强令瑞典印刷所印制的。这就为我们填补了一些空白,消灭了研究者的一些盲点。

所以,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述,雅林作为一个东方学家而言,不是以著作等身见称,而是以独特的角度为东方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向中国学术界、读书界介绍雅林先生及其东方学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工作。21 世纪与 20 世纪的世纪之交即将来临,而中国学术界要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完成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在各学科分别进入世界格局的整体学术运作,并保持领先地位的过程中,其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把改革开放的精神真正引入每一学科的园地,这样,学习国外学界一切优秀的成果,都是相当重要的。

瑞典是东方学——汉学相当发达的国家。高本汉、安特生、斯文·赫定开风气之先,其成果受到世界同行的推尊与引用。作为高本汉、斯文·赫定的晚辈,雅林一直为瑞典东方学——汉学界视为风范可循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正式出版雅林先生的著作,对于了解瑞典东方学——汉学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于东方学——汉学研究本身,当然更是久已期待的一件好事!